

檳榔嶼廣福宮史話

陳劍虹

1786年7月，法蘭西斯·萊特代表英國東印度公司佔領了檳榔嶼，作為他們向東南亞及遠東地區擴展其經濟勢力的基地。十九世紀初年，隨著商品經濟的穩健發展，喬治市逐漸形成一個各民族匯集的邊區墾殖社會。閩粵二省遷民在島上勞動生息，不僅導致本區人口結構的改變，和外領經濟的萌芽，也把華族先民筚路藍縷，創造傳承的傳統文化和宗教信仰帶到居留地綿延滋長。創建於嘉慶五年（1800年）的廣福宮，是早期華族的公廟組織，迄今已有一百八十八年的歷史了。

廣福宮的興建，和大馬華人寺廟的嚆矢，創造於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馬六甲青雲亭或有一定的淵源關係。青雲亭為甲華的精神紐帶，也是大馬奉祀觀音菩薩的第一個道場。1795年後，荷領馬六甲暫歸英國東印度公司托管。馬六甲的華裔商賈、本土的船商和旅居的勞工開始適度的涌入檳島，與各族人民共創天下。基於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經濟上的需要，以及崇德報功的宗教實踐，檳甲二地的閩粵華族先驅者於1800年通過集體力量，共同建立了廣福宮，主祀漳泉人士頌贊為觀音佛祖的觀世音菩薩，並且以俗稱媽祖的天上聖母為配祀。

領導建廟工作的是黃金銓和曾青雲兩位董事人。在吳、蔡兩位甲必丹，和近四百五十名善信和商業單位的慷慨輸捐下，一座耗資三千七百元，深宮中國鄉土建築藝術風格的廟宇終於在數月內，矗立在東印度公司所贈送的土地上。它旁依修竹，遠眺碧瀾，成為廣福兩省人民之精神依附和宗教活動中心，並於1803年正式繪進喬治市地圖內。同一時期，檳榔嶼甲必丹胡始明送出“欽崇福澤”匾額一方，叩謝菩薩慈恩。

1824年，閩幫值年董事青雲亭主梁美吉、林嵩洋、邱明山、甘時雨、邱峻整、謝歲、何道和謝清恩在新、檳、甲三地發動勸捐，共籌得七千九百九十五元，又得到胡始明哲嗣胡臻麟慨捐喜地，而增建後進一座，載祀列聖之像；立且在廟旁蓋造僧房，擴大規模，以顯測慈光之普照，尊神聖之莊嚴。1833年6月，東印度公司政府設立一個三人小組測定廟址，並於1838年發出列號2420的永久地契一分，總括前後二進及周圍土地，計24169方尺，歸為市區T. S. 19LOT71（2）。

美輪美奐的廣福宮，仿造中國傳統建築營造方式，利用斗栱與雀替的作用和技能，高度發揮了民間藝術的精華。此外，燕尾廟檐、雙龍剪黏、門牆和隔扇的木雕、石鼓和础珠的雕琢，也在洋溢著民間藝匠的心思和才華。在崇祀的宗教行為上，觀音菩薩和天上聖母是遷民在墾殖社會里的保護神，也是個人在祈求經濟福利和健康上的共同膜拜對象。對閩粵社會鄉土神的奉祀，也在縮短居留地與本土間之地理與精神上的距離，促進與濃化遷民們的鄉土意識上發揮其無形的作用；而對英烈神和人格神的奉祭，則不僅能激揚遷民們對它們的德言懿行，或其忠勇仁義性格的敬仰，更為延續華族固有的道德倫理觀念提供了實際的社會功能。

1830 年以後，檳華社會的內部結構開始呈現離心的現象。1860 年代，以方言群為基線的敵對秘密會社在奪取經濟資源和餉碼承包權上的糾紛，對檳華社會直接起着分崩離析的負面作用。伴隨着地緣為組織原則的區域性宗鄉會館的紛立，檳華社會幫權政治的矛盾進一步凝固化。這一不幸的現象影響到廣福宮的管理和維修，導致宮內樑撓楠折、磚裂瓦解。1862 年，廣福兩幫的值年董事，包括福建漳州海澄三都堡五大姓的楊一潛、邱石泉、謝昭盼、林樺郡和陳玉貌，以及杜宏謨，廣東新寧縣的黃進德、梅遠湛、黃百齡和梅耀廣，增城縣的馮登桂和香山县的林启发倡議重修廣福宮。經過一年的修葺，費資一萬一千五百零七元五角，廣福宮踵事增華，煥然一新，並且從一個宗教中心，提升為調解華社紛難的最高領導機構，在 1867 年的十日大暴動事件發生前，和社區領袖共同扮演了一定的息爭角色。這次的重修工作，以隣啣郡主龍溪縣的許泗漳，和新寧縣伍積賀為緣首。許泗漳也於 1866 年捐獻前進龍柱一對，和 1829 年黃順所送出的一對精雕石獅共為廟宇守護，一內一外，增加廟貌的壯嚴和美观，和石雕藝術的體積量感。

1850 年代初期，檳華社會的閩幫宗教結社，諸如存義社清和社以及同慶社等盛行於神誕節日舉行色藝游街，這或者是後來妝藝的濫觴。至於廣福宮則在諸神聖誕舉行酬神戲，也是香烟裊裊，庭階靄靄，引起了海峽殖民地政府的注意和干涉。1852 年，檳城的警察當局對華社的祭祖方式，大戲的演出和色藝的舉行採取限制行動。海峽殖民地政府更在 1856 年 6 月通過警察法令和治安法令，以保證公共秩序的維持。這一系列的壓制措施導致 1857 年 3 月 14 日廣福宮前的暴亂事件的發生，深化了官民之間的矛盾關係。

1872—1874 年的第三次拉律戰爭嚴重的弱化檳華社會的凝聚力，使幫權政治的矛盾公開化。廣福宮在閩粵兩大方言群體和各秘密會社間的紛爭和暴力活動的影響下，而失去有效的排難解紛社會功能。一些社區領袖，体会到有需打破狹隘的宗派主義和小群意識觀念之必要，以讓檳華社會從分化走向結集。另一方面，在 1879 年以後，海峽殖民地政府也決定通過對華族領袖採取安撫籠絡的態度，更深入地了解華社的感受和要 求，以溫和的方式處理華人問題，鞏固殖民地的統治秩序。1881 年平章公館的成立，是這二大客觀要求的自然結果。它代替廣福宮成為一個超幫的代表性組織，為檳華社會各方言群體尋找互相協調團結與合作的途徑。

平章公館仿效廣福宮的組織原則，由閩粵兩省商民各舉七名代表出任董事，統籌統辦有關華社之社會，文化和教育事宜。廣福宮的組織模式也為當時在籌建中的南華醫院內部組織，提供了一定的啟示作用，以維持閩粵兩幫的均衡勢力。事實上，廣福宮和平章公館之權力結構和領導方式不僅是建築在連鎖式的基礎上，而且也是彼此互為表里，息息相關的、在 1888 年 7 月以後，閩幫在廣福宮內的代表正式改由龍山堂邱公司、謝氏石塘世德堂、霞陽楊府植德堂、穎川堂陳公司，以及九龍堂林公司各二名代表充任，而廣幫代表則繼續由各府縣十名商紳擔任，這一終身制度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紀，並在 1952 年初正式列入章程，稱為信理部。

1895 年 8 月，閩粵二幫選出新領導層，並在 1897 年 9 月決定由粵幫代表黃進聰保

管平章公馆的地契，及负责广福宫之一切事务；而闽帮代表林花替则负责保管广福宫的地契。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广福宫有住持和尚一位，和属下僧人共同承包香火，并且为人建醮打斋，保运礼斗。由於他们之中一些人的行为不当，不能守志奉道，而受到公众人士的非议。殖民地政府因而在 1887 年委任二十名商绅，包括胡泰兴，许武安，邱天德，许森美和谢德顺等为该年董事，全权负责庙务，以及甄选适当的人选担任住持和尚。这一批新董事，最终礼聘了由福州鼓山涌泉寺来槟化缘筹建法堂的妙莲，及其随从本忠和得如二人驻锡庙内，为广福宫塑造新形象。不幸由於会党政治的涉入，这次的委任事件在平章公馆内部，及殖民地政府圈子里引起阵阵波澜。1891 年，妙莲在亚依淡鹤山下另创新观音寺，为後来完成於 1904 年的极乐寺舖下第一块基石。

进入二十世纪後，广福宫一如以前，在经济上资助平章公馆；而在庙务的处理上，也多通过平章公馆进行。1900 年的观音巡境庆典过後，即已经议定以十二年为期，禳灾祈安。1911 年 6 月恰逢英皇乔治五世登基，迎神赛会再次举行。观音佛祖，天上圣母，神农圣帝，保生大帝和关圣帝君各由平章公馆董事标得会首，自办香案，恭迎神驾。参与游行的有 50 个单位，好不热闹。欧战结束後，和平条约於 1919 年正式签署，殖民地政府动议大事庆祝。同一期间，感冒，天花和鼠疫横行，平章同人积极筹备消灾纳福，而於 11 月期间，即农历九月十九日观音出家纪念日第三度举行诸神出游之赛会，总共有 42 单位参与其盛。1928 年 7 月，平章会馆动员十一名董事与地方领袖，协助广福宫筹备第四度的观音佛祖游行盛会，强调参与游行之队伍以灯彩为主。游行庆典於 10 月末举行，队阵虽然远逊从前，其锣鼓喧天，大旗飘扬，以求祈福迎祥，保家安宅之盛况，则一如往昔。此外，在决定承标广福宫香烛，建醮会首和盖搭戏台等事项上，也都由平章会馆的总协理主持。

在弘法活动方面，由於广福宫质属香火庙，所以推广不力，未能收立竿见影之效。不过，在 1920 年代常有路过的法师在庙内讲经，最轰动一时的是 1923 年 2 月浙江宁波的圆瑛法师的主讲《过去现在因果经》。这一次的盛举，促成英属槟城普益讲经会的成立，由极乐寺住持僧本忠，广福宫住持僧广通，戴培基及谢自友等发起，并负责其活动。在同一年，广通也主持小规模募捐，以修补斑剥脱落的墙壁，并对匠额，槛联，銮驾和供桌等文物，予以添金油漆。这是自 1863 年以来的修建，献捐者包括五位印籍善信。

1941 年至 1945 年的沦陷期间，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广福宫更成为善信们进香，祷祝平安之地。1952 年 1 月，信理部通过实施“广福宫暨附属庙宇章程”，把广福两大方言群体职员的分配和职权制度化。章程规定广帮十名信理员由广东暨汀州会馆选出，而福帮则仍旧由邱、谢、林、杨、陈五大公司各派二名代表出任。它并且授予信理员实权，负责委任三年一任的住持和尚，以完善的管理广福宫和属下的受天宫和天公坛。信理部也在 1955 年立下规定，维护广福宫的尊严。九年後由於庙内墙壁深受烟火之薰，信理部拨款粉刷绘图。近年来，它开始进行社会

福利工作，与赞助佛教教育的活动；而配合今年的观音巡境庆典所举行的施济和布施，更是为人所乐道。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广福宫是槟华社会发展史上特定阶段的产物，它对观音菩萨信徒精神的支持，内心的慰藉，道德意识的提升，以及生命价值的肯定却已尽了潜移默化的功能。在社会的层次上，它凭藉超自然力量，界定道德范畴和规范社会行为，以适应社会变迁的要求。广福宫将壮健地屹立在美丽的槟榔屿上。